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義和團運動

賈 遜 編

巴 蜀 書 社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义和团运动

路遥编

巴蜀书社

一九八五年 成都

特约编辑：潘振平 张妮娜
版面设计：李明德

义和团运动 路遥编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插页2 字数417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书号：11329·10

定价：2.40元

出版说明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上的许多重大课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日益活跃与深入，史学界很多同志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同志，迫切要求对三十多年来对许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情况能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以便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为了满足史学界的这种要求，也为了给今后的史学工作者保留一套较完整的中国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这套丛书大致分为史学总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至一九一九年）三大类，每类又分为若干专题，按专题分册出版。每种专题分册又由三个部分组成：专题研究的概述、重要论文选编、论著目录。概述与编选都以专题讨论为中心，兼顾有关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已有的研究水平。编者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不代表编委会的意见。

丛书编委会由李侃、林言椒、王庆成、陈高华、袁庭栋五人组成，李侃为主编，林言椒、袁庭栋为副主编。工作机构设在《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由于我们对编辑这类书籍缺乏经验，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行提出建议和批评指教。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巴 蜀 书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概述 (1949—1983)	路 遥 (1)
(一) 对建国前义和团研究的简单回顾	(3)
(二) 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讨论	(17)
(三) 义和团组织、源流的探索	(42)
(四) “扶清灭洋”口号与政治思想的评价	(62)
(五) 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	(79)
(六) 对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侵略的论述	(101)
(七) 其他几个重要问题的概述	(115)

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论文选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戴 逸 (128)
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	刘大年 (136)
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	
——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张玉田 (143)
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王致中 (152)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	李 侃 (170)
从《山东义和团案卷》看义和团运动的几个 问题	荣孟源 庄建平 (177)
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	陈振江 (183)

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丁名楠	(196)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	朱东安等	(209)
义和团的源流·····	戴玄之	(224)
义和团源流试探·····	李世瑜	(245)
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	周海清	(255)
义和团源流刍议·····	徐绪典	(263)
义和拳和白莲教的关系·····	金冲及	(273)
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斗争中几个问题·····	陆景琪	(279)
义和拳·民团·义和团·····	陈贵宗	(283)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策略意义·····	毛健予	(297)
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吴思鸥	(307)
“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廖一中	(319)
义和团的两个旗号·····	陈贵宗	(331)
义和团皇权主义试探·····	戚其章	(339)
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	程 歆	(346)
义和团反帝运动被清政府利用的经过·····	何若钧	(366)
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	张寄谦等	(374)
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	苏寿桐	(385)
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廖一中	(391)
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林敦奎 李文海	(408)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兼与丁名楠先生商榷·····	吴民贵	(419)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李文海	(429)

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	
斗争·····	胡 滨 (442)
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	魏宏运、王 黎 (452)
关于沙俄争夺八国联军统帅权问题·····	薛衍天、李嘉谷 (464)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对外“宣战”·····	金家瑞 (473)
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	李德征、丁凤麟 (492)
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	林华国 (503)
义和团论文、资料索引 (1949—1983) ·····	(518)
后记 ·····	(567)

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概述^{*}

(1949—1983)

路 遥

八十多年前在中国北方所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为捍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运动，当它发展到1900年夏季时，就直接与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相对抗，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曾长期地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对于义和团的讨论研究，在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表的论文（包括歌谣、史料拾零等），计有七百多篇。出版的专著，有金家瑞《义和团运动》，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以及《义和团在山东》、《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四川义和团运动》等；此外，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三册）以及其他《中国近代史》教材、著述中，均有专章或专节论

*本文对义和团研究的概述，以1983年为界限，但个别地方也涉及到1984年所发表的论文。

述义和团运动。对于义和团的资料也进行了系统整理。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史学会着手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早出版的一种就是由翦伯赞等编纂的《义和团》，共四册，有一百四十六万字之多。之后，陆续出版的资料计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国海关与义和团》、《庚子事变文学集》、《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二辑）、《庚子记事》、《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教案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册）、《义和团源流史料》、《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英国蓝皮书中有关义和团运动选译》、《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一、二、三册）、《八国联军在天津》、《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上、下册）、《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俄中战争》、《八国联军目击记》和《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等等；此外，在《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分册、《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十九世纪美国侵华史料选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辑》第二卷、《俄国在满洲》和《近代史资料》等书中，都有不少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记述。以字数论，撇开后面这几种不是专述义和团的资料不计外，单以前面所列的二十一种专门记述义和团的资料来说，总计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万字之多。它为义和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为深入探讨义和团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没有如此丰富、系统的资料整理出版，义和团研究要想取得显著成绩并不断获得新的进展，恐怕是很难想像的。

在义和团的研究中，历来就存在着争论。建国初期，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集中在对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考察上，与之相关联的是

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以及义和团与清政府关系的探究等等。1960年8月在济南召开了“义和团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所讨论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纠正了过去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所作的种种诬蔑，恢复了义和团运动本来的反帝面目，但某些论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有“拔高”的倾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给义和团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干扰，致使一时间相继出笼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大批判”文章，成了林彪、“四人帮”散播影射史学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出现了新的繁荣。许多研究者对义和团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课题，促使义和团研究迈入了新的阶段。

建国后对义和团的争论，有不少是建国前的不同观点的延续。为了更好地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前的研究概况，应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①

（一）对建国前义和团研究的简单回顾

义和团运动自爆发之日起，就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的种种诬蔑和歪曲。当这个运动刚刚兴起时，封建地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因一时还弄不清义和团的真实面目，曾一度称义和团为“义民”，更多的人则一致目之为“邪教”、“莠民”、“土匪”。随着义和团运动失败、封建势力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

^①对建国前义和团研究概述的论文有两篇，魏晓明：《建国前义和团研究史的考察》，《历史教学》1981年第7期；罗超：《建国前国内研究义和团状况评述》，《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协，地主阶级中再也没有这种分歧的调子了。与此同时，发动过戊戌维新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利用他们的报刊，如《中外日报》、《新闻报》、《知新报》与《清议报》等，纷纷对义和团运动发表评论。他们对义和团不只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企图对这场运动的性质表明自己的观点，以便在现实斗争中确定自己的策略，并扩散自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中外日报》所发表的几篇评论。

《中外日报》从1900年6月起，就以《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论近日致祸之由》、《原近日守旧之祸》、《原乱》等为题发表评论，说：“义和团者，不始于今日，然终其本末，乃是四种旧党化合所成新物质也”。^①是哪四种呢？曰：野蛮派、小说派、闭关派和联俄派。“义和团之初起，必用前三派人，义和团之结局，必用后一派人”，“然则可以一言以断之曰：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②又说：“中国之乱，至今日极矣，莫不归咎于任事诸公。……而不知此番之祸实具有线索可寻、脉络相寻之理。综而论之，盖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而大祸遂作”。^③辛丑后一年，出版了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这是最早记述义和团运动的史作。《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有所顾忌，有说他“曾假外人名作序文，刊印一次，世未多见”；^④有说他“以触犯多，不肯示人，有窃录之者，托名日人小山乘信著，称庚子传信录”。^⑤后

①②《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关系》，《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

③《原乱二》，《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1900年12月8日）。

④惜阴：《庚子传信录》，《人文》月刊第3卷5期（1932年6月）。

⑤禅那：《庚子国变记》，《庸言》1卷1期（1912年12月）。

来他的朋友罗惇彞以此为根据，增补了西狩以后内容，被梁启超所索取，刊载于1912年《庸言》上。1913年罗又搜集其它文献记载并自己连年旅京、津所亲闻者，录为《拳变余闻》。李、罗所记述的义和团运动是在叙事中夹以评论，被认为是当时的“传诵”之作，影响较大。李希圣记义和拳之起，与戊戌变政、己亥建储有关；罗支持劳乃宣的观点，目义和团为“邪教”。此外，还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亦刊于1914年《庸言》上。该书对义和团的记述与罗氏基本相同，认为义和拳之起，以仇教为名，载漪等利用之以发大难，“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据此，可知这几部冠为“传信录”的史作，实都以《中外日报》之《原乱》说为其指导思想。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上有重要影响。

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相呼应，当时在华的外国资产阶级也大肆攻击义和团运动，斥之为“盲目排外”，诬之为“黄祸”。在华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是“黄祸”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之一。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出现十分惊惧，并认为这“无疑是官方的产物”，从而断定将来会有一个对待黄种人的问题，或是“黄祸”的问题，就象“太阳明天早晨一定会出来那样”。他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黄祸问题，并设法“去推迟或制止它的出现，或者采取某种行动使它转移到无害的渠道上去”。^①赫德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受到了在华传教士以及资产阶级工商界的支持与赞扬。他

^①赫德：《北京各国公使馆》（1900年8月），《中国问题书简》（英文本）第50、52页，伦敦1901年版。

们把赫德的“黄祸”叫嚷，看成是“先知”和“真理”。^①赫德的这些观点，后来被马士所继承，写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该书共三册，先后出版于1910年和1918年，第三册中有专章论述义和团运动。该书曾长期内被英美学者奉为圭臬，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主要参考书，也在旧中国的不少大学中流传过，对我国旧史学界的影响非同一般。

义和团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在1922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集了大成。该书第六章有专述义和团运动部分，其主要内容就是叙述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对于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他分为“因”与“缘”。“因”的方面又可分为“因之在心”与“因之在境”，即所谓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缘”的方面又可分为“亲缘”与“间缘”；所谓“亲缘”就是直接缘，而“间缘”就是间接缘；在“亲缘”中又可分为“主缘”与“助缘”。只有经过这一系列“因”与“缘”的汇合，才能生出“果”来。以梁的话来说，就是“因缘和合，果斯生焉”。从“因之在心”方面看，就是中国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即排外心理与迷信心理；从“因之在境”方面说，就是外力之压迫与政纲之废弛。“亲缘”有二：一是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即戊戌政变；二是宫廷阴谋之反拨。亲缘中有“主缘”与“助缘”，戊戌政变为主缘，且是唯一之主缘；康梁逃往国外，宫廷策谋废立与连年发生的教案都是“助缘”。此外，则是“间缘”、“外缘”，如日本之大陆政策，俄国之东侵政策与德国之远东政策，还有宫廷内母子之间猜嫌等等。由这许多“因”、“缘”和合所产生的“果”

^①法思远：《传教士的组织》，《教务杂志》（英文）第32卷第5期。

——义和团运动，则被称为是团匪蠢动、焚毁铁路、虐杀教徒、戕害公使、围攻使馆等集迷信与排外之大成的一种“极奇特之病态”，所以最后导出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订立等等一系列“业报”来。梁启超通过这一系列因果分析，把前述的改良派所持的守旧、训政、废立、排外四者相因论，“党祸之争”论，甚至外国侵略者“黄祸论”的某些观点统统包摄在他的历史研究法之内了。他对义和团的观点堪称为“集反动之大成”，成为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此后所出版的不少中国近代史著述，多是沿袭了这一唯心、反动的思想体系。如孟世杰《中国近百年史》（1925年初版）、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1927年）、王霁棠《中国近百年史问题研究》（1929年）等这些被称为高级中学教材的读物，对义和团的评价全系抄袭梁启超的观点，把义和团发生的根本原因或首要原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民众的排外心理——尊王攘夷与迷信心理——神佛万能所造成；另一些高级中学教材如李泰棻《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陆光宇《中国近世史》（1926年）、曹增美、黄孝先《新编国耻小史》（1928年）、陈怀《中国近百年史要》（1930年）、邢鹏举《中国近百年史》（1931年）、罗元鲲《中国近百年史》（1933年）等，虽与上述几本有所不同，认为义和团发生的原因在于戊戌政变后载漪、刚毅等守旧派措置乖方，溥儀被立为大阿哥，外国公使不贺，于是激起其狭隘仇外之心，遂利用义和团排外以发“大难”。其实，这些论点仍然没有摆脱梁启超所制造的“因之在心”与“因之在境”的理论窠臼，不过它更加强调其排外心理这一面罢了。此后所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著述，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说义和团时，士大夫其顽固者，反对采行外国制度，“偏

见之极，思想全为意气所支配，其下人民迷信痼深，或以闹教酿成暴动”，“山东为拳匪发难之地，其民迷信深痼，风气强悍，乐于战斗”，“其能胜之者，自群众心理而言，唯有神道，义和拳之说遂起”。^①这显然是强调其迷信心理的一面。蒋廷黻更对义和团加以总结说：“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②陈、蒋所宣扬的，仍是梁启超唯心反动观点的再版。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也已出现了支持或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言论。它最早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办的刊物中。1900年12月《中国旬报》第33期发表了一篇《主权篇》。这篇评论，力排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诽谤，指出“义和团之举事也，旗上大书曰‘扶清灭洋’，此皆为中国之民能知争权之显据”，“义和团与外国争权，虽所争之事未尽合理，而争权之兆已隐伏于四百兆人之方寸间矣”，“斯岂非中国自立之绝大起点？”在这里，它指出了在近代中国争民族独立之权乃是与争民主、自由之权相互关联的，所以它不仅把义和团视为谋自立，也视为谋自主、自由、之“质点”。并认定他日民智大开，则其质点“必发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之大国也。”^③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难能可贵的。1901年初发表在《开智录》上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是称颂义和团的另一篇杰作。该文充分赞扬义和团排外的反帝斗争精神，“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

①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489、501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②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05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③转引自骆宝善、桑兵：《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人心，忍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它还称颂义和团有四大功，认为有了义和团，使“林林总总四万万人始知有国耻”，“倾野蛮满洲之政府”，“茁固有民权之萌芽”，“使列强妄思豆剖瓜分不得不废然变计”，“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矣”。所以“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对义和团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①他最初对义和团基本上是否定的，如在1904年说：“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②但到了1908年，他的看法已开始动摇，虽也还说义和团的排外为野蛮暴乱，“然而足见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各国于是尽戢其野心，变其政策，不倡瓜分而提议保全支那之领土，开放支那之门户”。^③到了1924年，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更进一步认识到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④这时他虽还谈到义和团

^①过去一般认为孙中山是反对义和团的，近年来有几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见。可参看苏仲波：《孙中山与义和团》，《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赵矢元：《孙中山与义和团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王劲：《关于孙中山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②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③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

^④孙中山：《民权主义》。

有守旧的一面，但已不指责其排外，甚而转过来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崇外思想力予痛斥与批判。

对义和团的赞颂，在当时的外国进步人士中也可以听到。1901年日本青柳猛所作的《义和团赞论》，就是一篇与《义和团运动有功于中国说》相辉映的文章。在欧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于1900年11月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就是义和团，义和团人是爱国的，我祝他们胜利”。1901年2月，他又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一文，纽约反帝同盟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发行了十二万册以上，激起了广大北美人民的义愤，声援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①

在当时给予义和团最有力支持的，还是国际工人阶级政党。190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其机关刊物——《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铁拳》的社论，针对当时德皇在基尔港的反动演说，指出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乃是由于几年前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它还引用了当时维也纳《现代报》上所刊发的文章，说明由于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侵略，才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使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我们倒要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厉害些”。它号召工人阶级应看到“中国人在其维护中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们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能不寄予同情”。^②对德

^①转引自顾长声：《马克·吐温揭露传教士对义和团的镇压》，《学术月刊》1983年第5期。

^②《铁拳》，《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